

美国主义与反美主义的跨文化研究

——“9·11”前后英国穆斯林对美国的认知

□ [伊朗]赛义德·阿迈理 袁丽梅 译

允许酷刑的法律这样写道：“人类，忍受痛苦吧；假如自然赋予你不可遏制的自爱心，赋予你不可剥夺的自卫权，那么我则赋予你截然相反的感情：大胆地憎恨你自己；我要你控诉你自己，即使饱受皮肉之苦，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说出真理。”

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罪与罚》，1963年，第1页。

导言

跨文化理论，主要揭示人与人之间正面交流或负面反应的真相，并探讨其中原因。跨文化研究具有多学科性，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文学、政治研究以及文化研究。要理解友好、仇恨甚至战争与和平背后的盘根错节，就需要进行跨文化研究。这种研究给我们提供一种理论视角，来审视作为一种“主义”的美国主义。美国主义既给人一种亲切感，同时又具有破坏性的他者化特征。这一特征具体体现为“反美国主义”，即通过美国的外交政策来展示各种低劣的图景，来凸显其“伊斯兰恐惧症”和“中国恐惧症”。

美国主义所表达的是一种对美国的强烈热爱、归属和忠诚，它反映的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倾向，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美国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主义也可以解释为美国例外论的体现，可以看做一种美国的全球意识形态，即强调美国在历史、文化、经济、政治方面的与众不同。例外论不仅仅是表述美国身份与美国价值的核心，它更多地超越国界，来充当一股势力，推进美国的全球化或全球的美美国化。美国主义也反映出一种强烈的“排他性”，并且经常制造一种“报复文

化”，即歧视他者，或用正面表述：它有潜力来推行“美国民族主义”。

反美主义则是对“美国全球主义”的回应。它也是对所谓的“美国敌人”的描述，这种描述是由“美国媒体”炮制的，或通过美国国际政策再现于好莱坞和美国媒体。因此，反美主义可以说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炮制的反美主义”，即由美国国际政策描绘出来的美国敌人的形象；二是“对立的反美主义”，它表现为对美国国际政策的抗议。总的来说，反美主义不是一种新现象，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之前。那时，美国正确立它在全球的毫无异议的霸权地位，菲律宾则有了反殖民的武装抵抗，纳粹则在魏玛颠覆了提倡社会民主的亲美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纳粹之前的亲美主义在欧洲其他进步地区和别的地方也有响应。（Connery, 2001）

在这里，反美阵营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互反应并不能解释隐藏在美国主义背后的主要原因。穆斯林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以及有着不同宗教、种族背景的社会活动家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反美方式，这说明任何话语，如果以种族中心或宗教中心来解释的话，是行不通的。对于“9·11”事件，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辩证对立法并不适用于解释穆斯林对此事件的反应。比如，现实/虚幻、秩序/混乱以及理性/非理性这些相互对立的词（McLaren, 2002）就不适合于描述穆斯林与美国或美国中心主义的关系。看来，我们需要根据当前社会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种种变化，来重新阐释美国与“他者”之间的关系。

在文章中，我将以跨文化威胁论（Zee, 2004, Worchel, 2005）为基础，考察英国穆斯林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两者在“9·11”后的关系。本文将描述一次定性研究的结果，这个研究是在2004年9月完成的，研究的目的是考察英国穆斯林对美国的认知。通过研究，我将从类型学上展示对美国整体认识的不同看法与观点，同时解释人们为何会“对美国产生负面理解”。在讨论被采访者对美国认知的问卷时，我力图阐释他们对美国文化否定、接受，甚至与之同化的原因。“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模式在解释这种现象时主要是依赖种族中心主义、种族相对主义、或者宗教中心主义的综合理论框架，它也主要是对威胁境遇的一种回应。

看来，种族中心主义、种族相对主义及宗教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并不足以解释当代社会。这时，新的研究取向应运而生，它就是个体权力化方法（Elliot, 2005, 2006）。个体权力化来源于高等教育的发展、知识的多元化以及与“他者”的交流、“选择”的多样性。这种方法也可以称之为“追求纯粹真理的取向”，因为它不再依赖“民族”、“种族”、“性别”或任何其他集体主导力量，这类力量会强